

开启东亚的“后蒙古时代”？

——试谈东亚史的一个关键时期（1368-1420）

中国·复旦大学·葛兆光

【内容提要】

14-15 世纪之间（1368-1420），笼罩欧亚的蒙古势力在东亚逐渐溃退，这是东亚各国关系重新调整的枢轴时代，或许我们可以把它叫作“后蒙古时代”？在这半个世纪中，东亚经历了妥协、冲突、再平衡，终于在“应永外寇”/“己亥东征”事件之后，大体形成了一个以朝鲜“事大交邻”为中心，彼此协调的东亚新秩序。很多历史学家曾经把“蒙古时代”看成是世界史/全球史的开端，但“蒙古时代”之后，作为世界史一部分的东亚史，它的基本特点是什么？我认为，这是一个值得讨论的历史问题。

—

历史上，有一些“关键时期”值得一再讨论。

在中国史上有不少“关键时期”，使得前后两个时代呈现出不一样的历史风貌，这里不妨举两个例子。一个是唐宋之际，内藤湖南的“唐宋变革”假说一出，立即让人聚焦 755 年（安史之乱）至 1005 年（澶渊之盟），历史学者纷纷要考察这两个半世纪，如何造成了中古中国与近世中国的巨变¹；再比如，张灏所谓中国近代思想史上的“转型时代”，则把 1895 年到 1925 年凸显出来，晚清民初的甲午战败、戊戌变法、辛亥革命和五四运动被连接起来，在知识群体、新闻出版、教育选举、政治制度、宗教文化等方面，显示了传统中国与现代中国之间的深刻转型²。

这种历史“关键时期”的意义，简单地说当然可以使用“承先启后”一词。已经有学者指出，在这些“关键时期”，往往造成一个王朝/国家内部的深刻变化；但是，在超越王朝/国家的区域史里，是否也可以有一些重要时期值得讨论呢？在这些“关键时期”中，各个国家与地区的位置、力量与利益在重新“洗牌”，过去的平衡被打破，新的平衡被建立起来，于是，奠定了后一段历史时期的稳定，构筑了一个较大区域的国际关系。

我想提出来的，就是蒙古的世界帝国在东亚逐渐解体之后，从 1368 年到 1420 年发生在东亚的一段历史³，我以为，这一段时期也可以算是东亚史上的一

¹ 内藤湖南《概括の唐宋時代觀概括の唐宋》，日文本，见《歴史と地理》9卷5号（1922.5）：1-11页；英文本，见宫川尚志：《An Outline of the Naito Hypothesis and its Effects on Japanese Studies of China》，载 *Far Eastern Quarterly*, Vol.14; No.4（1955），p.533-552；中文本《概括的唐宋时代观》，黄约瑟译，载刘俊文主编《日本学者研究中国史论著选译》（北京，中华书局，1992）第1卷《通论》。

² 张灏《中国近代思想史的转型时代》，载张灏《时代的探索》（台北：中央研究院·联经，2004），51页。

³ 已经有人提出，世界近代史应当从蒙元溃退、明朝建立的 1368 年开始，见赵现海《世界近代史的起点

个“关键时期”。因为在这五十年里，蒙古势力逐渐退却，东亚的大明王朝、李朝朝鲜和足利日本，在经历了复杂的往来、折冲和妥协之后，以“应永外寇”/“己亥东征”事件为节点，大体奠定了此后东亚的基本格局：即以朝鲜“事大交邻”为轴心，构成了明朝、朝鲜、日本的基本平衡。此后几个世纪中，尽管也有倭寇事件、“壬辰之乱”、“明清易代”这样一些动荡和变化，但是，这个东亚国际的基本平衡格局一直延续了数百年，要到十九世纪中期，才被西方来的坚船利炮所彻底颠覆。

二

让我用最简单的方式，鸟瞰 14、15 世纪之间（1368-1420）这五十来年的历史。

横扫欧亚的蒙古大帝国在十四世纪中叶之后，在东亚逐渐溃退。1368 年，朱元璋推翻元朝，建立了汉族统治的明朝；1392 年，李氏取代高丽王氏建立朝鲜；同一年，日本室町幕府将军足利义满逼退南朝后龟山天皇，结束南北分裂的局面；1400 年，安南的黎氏取代陈氏；五年之后（1405），一直对明王朝构成威胁的帖木儿去世，帖木儿帝国陷入争夺汗位的混乱中，不再有余力觊觎东亚⁴。

我们可以把这一段时间，看成是“蒙古时代”之后的一个关键时期。在这个关键时期里，东亚各国之间都在调整。一开始，明初中国并不稳定，内部问题牵扯，因此，一方面试图重建以明朝为中心的朝贡体系，另一方面也采取妥协的方式，宣布“十五不征之国”⁵；一方面重点放在东北和西南，试图廓清边疆隐患，另一方面又对周边异国采取安抚政策，甚至对鞑靼和兀良哈也采取招抚策略⁶；而新建立的朝鲜王朝既要得到明朝的承认，不能不采取“事大”的姿态，也要缓和与日本的关系，重新建立“交邻”的关系；日本足利义满既要小心明朝与朝鲜联合对日本构成威胁，又要试图改变“元寇”之后日本的孤立状况。自从 1374、1380 两度被明朝拒绝遣使往来之后⁷，为满足明朝的虚荣，1401 年以“日本准三后道义”之名上书，接受明朝册封，又以对等方式，用“日本国王”对“朝鲜国王”，和李朝朝鲜建立邦交。而 1405 年帖木儿去世后，继任人也改变原来的态度，与明朝建立了比较友好的关系。

这样，在东北亚暂时形成了一个彼此妥协的新秩序。

三

但是，在十五世纪初，明太祖、李朝太祖、足利义满相继去世，接下来的继承者似乎试图改变这种相对平衡的东亚秩序。永乐皇帝不仅先后五次远征蒙古余部，而且向南试图将安南“改土归流”，建立属于明朝的交趾⁸；足利义持则居高

与明代中国的历史分流》，载《中国史研究动态》（北京）2016 年第 5 期，42-43 页。

⁴ 英国学者 John Darwin 在《后帖木儿时代：全球帝国的兴与衰》（陆伟芳、高英芳译，大象出版社，2011）也注意到在帖木儿帝国解体之后，对于全球历史的影响。

⁵ 《明史》卷三百二十二《外国三·日本》记载“列不征之国十五，日本与焉。自是，朝贡不至，而海上之警亦渐息”。8344 页。

⁶ 见《明太祖实录》卷一二四（洪武三十五年十一月壬寅条）。

⁷ 田中健夫《中世对外關係史》（东京：东京大学出版会，1975），特别是第一章。

⁸ 可以表现永乐皇帝这种进取姿态的，除了征服安南和远征蒙古之外，还包括（1）七次派郑和下西洋，开拓东南亚及印度洋，（2）派遣宦官赴阿姆河流域，（3）设置努尔干都司，（4）派遣侯显、李达赴内亚和西藏等等。

临下，不再承认大明的宗主地位⁹，又以“日本将军”对“朝鲜国王”，试图在国际关系上凌驾于朝鲜；而朝鲜强硬的国王，则于1419年突然进攻日本的对马，引起日本的极大震动，而明朝也一改洪武朝的保守策略，同一年，以望海涡一战，肃清倭患，鼓励了朝鲜对日本的强硬态度。

正是在这个关键时刻，日本派遣博多妙乐寺僧人无涯亮倪去朝鲜，恰好也在这一年，强硬的朝鲜太宗去世，本来就不赞成所谓根本解决倭寇问题的朝鲜世宗执政，两国之间的紧张关系才算得到缓解。正是在这一逐渐和缓的国际背景下，第二年（1420年），朝鲜方面以宋希璟作为“回礼使”出使日本，并向日本赠送大藏经，开启了此后长达数百年朝日外交交流史，也基本奠定了以朝鲜“事大交邻”为轴心的东亚国际秩序¹⁰。尽管此后也有“壬辰之役”等等波澜，但在近代西潮东渐，根本改变东亚面貌之前，大体上东亚的中国、朝鲜、日本、蒙古、琉球、安南诸国之间，仍然延续了“后蒙古时代”的这一基本格局。

四

很多历史学家都把蒙古帝国时代，看成是世界史的开端，比如本田实信、冈田英弘、杉山正明等¹¹，但是，也应当注意到，这个横跨欧亚的世界历史，刚刚翻开一页，就遭遇剧烈变化，这个世界从合而离，又分成若干个各自独立的空间。从蒙古帝国统治和威胁下解脱出来的东亚诸国，在“蒙古时代”之后，就出现了有意思的变化，形成了一个特别的历史世界。

在这一段时间里，东亚各国都开始重建自己的政治与文化。

首先看中国。明朝建立以后，为了确立取代蒙元的大明王朝的合法性，朝廷开始广泛并严厉地“去蒙古化”。张佳《新天下之化》中指出，明初重建汉族文化传统，不仅仅包括简单的“禁胡服、胡语、胡姓”，也包括对不同等级人士的服饰制度的规定，对混入胡人风俗的婚丧制度的管理，对社会上各种等级制度的强调，对各种礼仪风俗的重新规范，明初官方通过一系列严厉的整肃，试图恢复汉族传统生活规范、重建士农工商的四民社会，以及塑造上下有序的儒家政治秩序，也就是“从文化、风俗、文献甚至血统上，泯灭蒙古的存在”，特别是，明初通过科举考试与提倡儒学，使得政治与文化又重新回到汉族中国传统轨道¹²。

其次看日本，正如内藤湖南在《日本文化的独立》一文中指出的，“蒙古袭来”事件非常重要。日本的“文化上对外独立的观念的产生，与这些事情（蒙古大军船只被大风刮得七零八散，溃不成军）的发生有很大关系……日本一直把中国尊崇为日本文化之师，可就是这位文化之师居然被犬的子孙蒙古所灭，……正因为如此，对日本来说，中国也就不足为尊了”，从此发展出“日本乃神国”的

⁹ 永乐九年（1411），足利义持拒绝接见三宝太监王进，王进只好靠“夷妇密引”，才得以从兵庫回国；永乐十六年（1418）三月，又拒绝接见明朝行人吕渊，不允许他进入京都。参见汪向荣《明史日本传笺证》（成都：巴蜀书社，1987），44-46页。

¹⁰ 当然，日本国内形势是一个重要原因，由于在“应仁之乱”（1467-1477）后，日本陷入长达一个世纪的内乱，根本无暇顾及海西，只是由山口的大内氏以“日本国王”名义，掌控了白银开采与海外贸易，所以，东亚海域内国与国之间关系大体上相对平静而彼此冷淡，搅起局部风波的，只是倭寇的沿海骚扰与掠夺。一直要到丰臣秀吉统一日本，才开始发生变动。

¹¹ 见本田实信《モンゴル時代史研究》（东京大学出版会，1991）；冈田英弘《世界史的诞生：蒙古的发展与传统》（陈心慧译，台北：广场出版社，2013）；杉山正明《忽必烈的挑战：蒙古帝国与世界历史的大转向》（周俊宇译，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，2013）；杉山正明《蒙古帝国的兴亡：军事扩张的时代·世界经营的时代》（孙越译，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，2015）。

¹² 张佳《新天下之化：明初礼俗改革研究》（上海：复旦大学出版社，2014）。

观念，加上后来怀良亲王针对明太祖的威胁，采取强硬回应的态度，使得日本在中国面前开始扬眉吐气。所以内藤说，因为这些背景，“日本文化从根本上实现了独立”¹³。

再看朝鲜。在依违于北元与明朝之间的高丽王朝于十四世纪末被李氏取代之后，新兴的朝鲜王朝开始重新调整对中国的交往姿态。一方面在政治上，他们承认明王朝作为宗主国，也接受明朝的册封，但也觉得朝鲜只要“且卑辞谨事之”就可以了。但另一方面在文化上，他们则开始采取比明朝更加严厉的措施，推行儒家尤其是程朱理学的政治理念和道德伦理。表面上看，朝鲜王朝似乎与明代中国有着颇为相似的政治与文化，但由于朝鲜的国际位置、政治制度与社会结构，因而比起中国来，他们的儒家观念、伦理制度以及道德要求，比起中国来更加严厉，并且维持更加久长，因而逐渐滋生出谁更“中华”的自觉意识¹⁴。

五

1420年，永乐皇帝从南京迁都北京，这时，蒙古势力已经逐渐衰退，不再能直接威胁东亚¹⁵。同一年，朝鲜使臣宋希璟赴日本，朝日之间开始呈现稳定的关系。

那么，在“蒙古时代”之后，东亚史或者说东亚关系史基本特点是什么？我的看法是，在欧洲坚船利炮进入东亚，打开东亚大门，形成“冲击”之前：（1）环东海诸国以朝鲜“事大交邻”为中心，大体有一个基本稳定的东亚秩序，这个秩序从十四世纪中叶之后开始形成，到十五世纪二十年基本奠定，一直延续到十九世纪中叶，几乎延续了四百多年；（2）由于蒙古入侵与溃退，刺激了各国文化上的“自我中心主义”崛起，也就是说，各国在政治与文化上的独立意识逐渐唤醒而形成，过去混沌一团的“认同”，出现了政治承认、文化认同和经济利用之间的分化，特别是在中国发生明清易代，日本和朝鲜认为中国已经“华夷变态”的17世纪中叶之后，这种认同上的分离状况就越来越严重；（3）环绕着东亚海域，形成了一个贸易圈，官方的朝贡贸易只是其中很小的部分，更重要的是商贾推动的物质流通。在这四个多世纪中，在这个环东亚海域的国际环境里，各国在经济上彼此联系，在文化上开始竞赛，在政治上互相角力，其间虽偶有激烈冲突，但又往往能够相互妥协，这个历史格局一直延续到西方通过坚船利炮对东亚发生冲击的19世纪中叶。

2017年4月匆匆于上海

¹³ 内藤湖南《日本文化的独立》（1922年的演讲），载内藤湖南《日本历史与日本文化》（刘克申中译本，北京：商务印书馆，2012）117页、122页。

¹⁴ 如朝鲜儒学学者李退溪就认为，严格遵守儒家的伦理道德，才是“中华”之所以为“中华”的根基，因此，文明不一定以圣贤和经典所产生的地域来确立，朝鲜当然也可以成为文明的正宗，这就是后来朝鲜“小中华”意识的渊源之一。李退溪在《成王皇华集序》就说，“我东国天昼壤地，邈在海表，然而箕子之所受封，孔圣之所欲居，礼义文献之称，其来尚矣”。见《朝鲜文集丛刊》第三册，卷五十九，261页。

¹⁵ 在永乐时代，明王朝对北方蒙古采取进逼姿态，永乐屡次北征，蒙古内部也出现问题，因此，鞑靼和瓦剌两大部暂时安定，瓦剌三王、阿鲁台封爵，兀良哈建三卫，随后又被击溃，因此北方边疆暂时稳定。